

中外传媒体制创新丛书

 国家“211”工程二期项目报告

主编 童兵

中国

翔实披露行业生态 全景观察运作机制
中国文化传媒体制改革的参考书

出版体制创新

Innovation of Chinese
Publishing System

博 玫 /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国家“211”工程二期项目报告

中外传媒体制创新丛书

主编 童兵 副主编 孟建 张涛甫

博 玫 / 著

中国出版体制创新

Innovation of Chinese
Publishing System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出版体制创新 / 博玫著.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80652-628-6

I. 中... II. 博... III. 出版工作—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G23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0978 号

中国出版体制创新

著 者: 博 玫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 (020) 87373998-85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投稿热线: (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 (020) 87373998-8502

网址: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1	总序 为传媒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1	第一章 出版：一个亟待厘清的概念
1	第一节 出版关键词：编辑、出版
11	第二节 理念出版与职业出版
25	第二章 权力意志建构中的新中国出版体制
25	第一节 1948年前后：酝酿中的新中国出版体制
25	一、新中国出版理念建设
30	二、新中国出版体制建设
36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新中国出版体制
36	一、建国初期出版业的分工专业化变革
40	二、新中国私营出版业的整顿与社会主义改造
47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出版业的现状与政策调控（上）
49	第一节 “文革”对中国出版业的摧残
49	一、“文革”对各出版环节的破坏
54	二、“文革”中出版社主体性与编辑独立精神双重丧失之探析
77	第二节 “文革”后出版业的治理整顿与新时期出版体制改革
77	一、批判“两个估计”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艰难进程
80	二、新时期早期的出版体制建设与出版业的恢复调整

目录

MULU

87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出版业的现状与政策调控（下）
87	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出版业的变革
87	一、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与出版业的拨乱反正
94	二、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双重属性
99	第二节 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出版体制改革
100	一、“放权让利”与发行体制改革
110	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出版体制方针
114	三、民营书业的兴起
124	第五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出版体制变革
125	第一节 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初期的出版体制改革
140	第二节 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出版体制创新
140	一、出版业的集团化建设
143	二、出版单位试点改革的政策与措施
146	三、出版业的转制
161	附录
161	附录1 《出版总署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
163	附录2 《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各部门业务的决定》
167	附录3 《出版总署关于国营书刊出版印刷发行企业分工专业化与调整公私关系的决定》
173	附录4 《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五项决议》
178	附录5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
181	附录6 《中央宣传部转发出版总署党组关于改造私营图书发行业的报告》

186	附录7	《中央宣传部批转出版总署党组关于整顿和改造私营出版业的报告》
192	附录8	《新华书店总管理处书稿报酬暂行办法草案》
194	附录9	《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试行办法》
196	附录10	《关于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
198	附录11	《书籍稿酬试行规定》
202	附录12	《书籍稿酬暂行规定》
206	附录13	《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
209	后	记

第一章

出版：一个亟待厘清的概念

第一节 出版关键词：编辑、出版

现代出版中，“编辑”是图书传播活动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图书在出版前必须先有书稿，图书内容的第一生产者书稿的作者，由于书稿仅仅是图书的原料或半成品，因此书稿形成图书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编辑是主要的工作环节。编辑的作用主要是对书稿进行筛选、审读、编辑加工和技术设计等，编辑和作者都是图书内容的生产者，编辑的劳动同样具有创造性，所以，在由书稿形成图书的过程中，编辑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

“编辑”一词最早见于《魏书·李琰之传》^①，其中记载：秘书监李琰之修撰国史，“前后再居史职，无所编辑”。又《北齐书·魏收传》^②中记载：魏收“所引史官……刁柔、裴昂之以儒业见知，全不堪编辑。”《北史·孝行传》^③中记载：“今赵琰、李棠、柳桧……入别传及其家传，其余并从此编辑，以备《孝行

① 北齐史学家魏收于公元553年始纂修。

② 唐太宗贞观年间史学家李百药所撰。

③ 唐太宗贞观年间史学家李延寿所撰。

传》云。”又《北史·循吏传》^①中记载：“其余皆依时代编辑，以备《循吏篇》云。”前两例中，“编辑”一词当指史官编修史书的活动；后两例中，“编辑”仅指编排次序而已。

《南史·刘苞传》^②中记载：“刘苞少好学，能属文，家有旧书，例皆残蠹，手自编辑，筐筐盈满。”此处的编辑，指的是“校理”工作。《颁行新令制》中记载：“然以万机事广，恐听览之或遗；四海务殷，虑编辑之多缺^③。”此处的“编辑”指的是文字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干禄字书序》曰：“若总据《说文》，使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不庸虚，久思编辑。”“顷因闲暇，方契宿心。遂参校是非，较量同异。其有义理全僻，罔勿毕该。点画小亏，亦无所隐^④。”此处表明，编辑不仅在于形式上的编次，而且在于对内容的审定。

综上所述，“编辑”最早使用于史官编修史书的工作中。古代“编辑”一词的概念内涵较深，既指文字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又指收集材料，整理成书，还可以理解为对古籍的校理，甚至编辑的活动，最重要的是指对内容的审定和校理。

“编”和“辑”起初是两个单音节词，彼此毫无关联。甲骨文中“编”由“册”与“系”合成。《说文解字》：“编，次简也。”清段玉裁注曰：“以丝次第竹简而排列之曰编。”这里的编就是顺次编排之意。“辑”，本义车輶；又同“集”，特指搜集、辑录。如《汉书·艺文志》：“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司马迁传》：“赞曰……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辑”，又通“缉”，所以早期“编辑”与“编纂”经常通用。

在古代，“编”通常作为动词用，在词义上既指编纂，也指编撰。

《词源》解释，“编纂”与“编辑”同义，无论古今两者均可互训，且都不带有著述的意思。“编撰”的“撰”，在古汉语中，有时与“纂”通假，更多的解释为著述，编撰即编写的意思。

“编纂”和“编撰”均为成书活动，指收集史料、发凡体例、校正是非、确定取舍、纂集成书的全过程，其要在于体例创新、内容精当。只是“编撰”除编纂性质外，还有著述性质，所以编撰又是编写，指将各处所收资料，按编撰者具体的构思和理解撰写成一部系统的书稿的另一种成书性质。如，孔子编《诗经》属于编

① 唐太宗贞观年间史学家李延寿所撰。

② 唐太宗贞观年间史学家李延寿所撰。

③ 载（唐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唐大诏令集》。

④ 见《鲁颜公文集》补遗。此篇序文是颜真卿伯父颜元孙所作，误收在颜真卿的文集中。

纂性质，而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则属于著述性质，因为《资治通鉴》编写过程中，不仅包括了编纂的工作，同时还包括依据各人专长来选择相应历史阶段的作者撰写、组织专人审读全文、确定统一纪年标准保证作品组合的有序化、制定辨伪考异的方法优化编写成果等编辑性质的著述性劳动在其中，体现出“编著合一”的现象，也是古代编辑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①。

由此可见，古代编辑尽管通过辑、校、审、编等基本手段，整理编纂典籍文献，但并非是文献资料简单的次第罗列，也不仅仅是以匠心见长的编辑行为，而是编者理念在编辑过程中的创造性劳动。尤其是部分文献书籍的“编著合一”现象，使书籍不仅包含著述性的精神劳动因素，也包含编辑性的精神劳动因素，所以编者的编辑理念与书籍的内容密切相关。“编辑”成为图书辑成传播的第一把关人。

这里借用的“把关人”概念，其含义不仅仅包括怀特式以主观偏向为重的个人把关，还包含着渗透于整个编辑活动（包括编辑业务在内）中的组织控制和社会政治背景因素。这使得“编辑”的内涵与外延因此而拓展。

控制编辑机构、设官置局是封建政权钳制思想言论的途径。史官是我国最初的编辑工作者之一^②，在甲骨卜辞记载商周史事的典籍中，“史”出现的频率相当频繁。王国维在《释史》说：“史为掌书之官”，“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商周时代起，史官即受命为王起草册命，代王宣命，且负责记录王室朝廷的重大事件以及天子诸侯的言论、典藏朝廷的文献档案等要务。归纳而言：史官的主要职责，一是保管历代典籍，二是记录当代重大事件，三是编修本国史书。只是这些书籍仅限于为王权和宫内及官吏阅读所用，所以无法广泛用于文化传播。

中国古代具有悠久的史官制度，早在黄帝时就有史官仓颉、沮诵，虞舜时有伯夷，夏有终古，从甲骨卜辞算起，我国有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最晚从殷商就开始了。统治者为了张扬自己的朝政，在政权建立之时，首先重建或修建、整理、典校国家藏书；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政权的巩固和统治寻求历史依据，他们十分重视修史，置官设局。古代的史官制度，发展到两汉，开始逐渐将记事、修史、典校书籍和刊行集于一体，如西汉石渠、天禄之阁，东汉的兰台、东观。隋唐以来不断完善的秘书监、史馆、国子监、翰林院等机构的应时设置，构成了历朝政府绵延千余年、直接为统治者服务的编纂体制。

此外，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历来对书籍的监控很严，他们企图通过对文化思想

① 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2版，第3页。

② 我国古代最初的编辑是卜筮官、史官、乐师。

的钳制，巩固封建政权。自先秦以来，中国古代大规模的编纂出版活动多数是由王权授意、朝廷组织，历代大型图书几乎出于官修，这与中国历朝相沿不绝的编纂刊行制度有关。

丛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图书编纂类型，将若干种书籍按一定的意图汇辑一起，冠以总名，故称丛刊或丛刻、丛编。《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这部丛书编纂历时9年，基本上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反清著作除外），系统地保存了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对传统学术作了全面的总结和评价。丛书收录之书均从全国广泛征集的数万种图书中遴选出来，并经由当时一流学者纪昀、陆锡熊、戴震、邵晋涵、翁方纲、王念孙、周永年、金简、任大椿等精心校勘考订，自先秦至清乾隆间尚存和新版的重要典籍借此得以保存下来，是我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一部丛书。

但是，这部丛书的成书和编辑目的却十分明确，通过大规模的征书编修工作，将各类书籍中反对满清统治的思想内容完全禁除。

康熙、雍正两朝的文字狱，使得汉人谈虎变色，为了巩固专制政权，缓和矛盾，统治者企图通过大规模的征书、编修活动，一方面宣传封建道德、巩固统治、麻痹民众对抗情绪，另一方面以提倡复兴文化为名，拉拢知识分子、消灭异己文化，对不利于清统治者的著作一律加以篡改，甚至销毁。当时，清政府设立了三个查办机构：红本处、四库全书馆、军机处，对呈进之书进行严厉的审查。乾隆年间的禁书运动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与《四库全书》的编修时间大致相始终。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旷日持久的禁书运动，致使3000种左右的书籍被销毁，传统文化典籍遭受了空前的劫难。

有书籍就有编辑。我国古代编辑工作起源于文献的整理，最早能见到的文献实物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的甲骨卜辞，只是这些文献实物并不是以传播知识为目的，不能称其为今天意义上的书籍。公元前6世纪，孔子以这些文献资料作为“六经”的编辑素材，选编了《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经书，这些经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籍。

古代编辑的初始阶段，无论是编纂还是编撰，书籍通常是编者思想的直接载体。孔子编书已有明确的编辑思想，他选编《诗经》的原则是“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①”，意思是将重复雷同的内容从中去除，只选有助于礼义教化的内容，孔子编《春秋》：“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由此可见孔子

^①《史记·孔子世家》。

的编辑思想，和以此宣扬自己政治意图的人生理想。

即便是受命于皇权的史官修书，其编辑理念依然是客观求实的编辑精神和史家的传统。“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封建专制王权对异端文化的钳制和思想禁锢，中国远古典籍因此惨遭浩劫。但是即便在这样的封建专制下，由秦始皇的相国吕不韦组织编写的《吕氏春秋》秉承的依然是史家的传统：客观务实精神。

《吕氏春秋》编成于秦统一六国的前夕（公元前237年），该书的编纂风格相当严肃，据刘汝霖^①《吕氏春秋之分析》一文统计，在该书160篇文章中，儒家学说的有26篇，道家学说的有17篇，墨家学说的有10篇，法家学说的有43篇，名家学说的有5篇，阴阳家学说的有2篇，纵横家学说的有10篇，农家学说的有4篇，小说家学说的有1篇，兵家学说的有16篇，其他几篇学派观点并不明显。该书虽然编排有系统，俨然一整体，但是并未把各种纷纭的说法作人为的统一，诸子百家的学说在各自的篇章中仍具有独立性，该书没有一概排斥名家的言论，但反对不切实际的诡辩；它收录了不少墨家的学说，但不取他们的鬼神之说；它引用庄子、列子的宇宙观，却不采取他们那种荒诞无稽的说法。《吕氏春秋》成书后，吕不韦将之公布于咸阳城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予千金”，该书的價值可窥一斑，《吕氏春秋》的编辑代表了秦国最高学术水平。

在我国古代早期的史书典籍的编撰中，尽管编辑理念与书籍内容在思想上通常一致。但是，对史书和典籍的修纂，更多的还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识。统治阶级企图通过控制编辑机构、修史编纂等活动，进一步渗透其专制制度、拉拢知识分子和控制人们的思想，以巩固封建皇权。

此外，封建统治者使用酷烈的文网，变相地控制典籍的编纂和书籍的著述。先秦的“焚书坑儒”、清代的“文字狱和禁书运动”，使得数以千万计的饱学之士被株连、人头落地、满门抄斩，中华文化惨遭无以弥补的损害，封建文人噤若寒蝉地埋头故纸堆，自觉地服务于封建皇权。上古时代的珍稀典籍在焚书中被毁，不知多少种书籍在禁书中被销。上古典籍和历代文献向来是古代编纂的来源，大批典籍的销毁，造成编纂工作严重脱节，即使有一些幸存的残稿，多半也是支离破碎，给后人的编辑、加工整理带来了后患。

从古代编辑的功能演变我们可以发现，早期的“编辑”是书稿成书的重要环节，编辑理念中更多的是编者个体的思想行为，体现的是编者与书籍两者之间的关

^① 详见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2版，第43页。

系。随着个体行为不断地融入（或者就是被迫控制于）组织和社会利益中，“编辑”的功效发生了变化，编辑的理念成为（或者就是扭曲为）个人理念与国家权力意志交错磨合的社会行为，并且这一行为随着政权的更替、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不断地发生着相应的变化，编者与书籍之间的关系，最终演变成了书籍（作者）、编辑、权利组织（社会背景）彼此间多重的利益勾连。

现代社会，随着图书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现代出版机构的成熟，编辑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规范不断加强。现代出版中，古代编辑内容最重要的编纂工作完全让位于出版社外的作者，专业化的编辑工作主要是组织、审读、审定书稿，做出版前的把关工作。日臻完善的编辑职业化倾向，使得古代编辑理念凸现的编者个体思想行为完全被社会规范的职业化行为所取代。

当代“编辑”甚至主动突破了书籍的框架和文字的范围，自觉地成为社会权力控制下的一种准技术操作行为，投入各种媒介机构成为专业编辑并从事着各自的编辑业务。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尤其是商品社会和互联网的加盟，编辑的内涵与功能还将不断地拓展、演变，譬如以编辑策划为头衔的出版经济人，在出版领域内正纷纷活跃着，当代“编辑”的概念似乎变得模糊起来。

二

出版是一种传播活动，它通过相应的技术力量和编辑的理念将作者的手稿（作品）转化为书籍（出版物），其目的就是传递以书籍（出版物）为载体的信息，出版活动必须由编辑、排版、印刷、装帧和发售等环节构成。

“出版”一词在我国是外来语，大约在近代机械印刷工业初起的19世纪下半叶从日语中引进。我国古代出版活动的出现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密切相关，在此之前古代出版的含义仅仅指将手稿刊印成书籍的工作。雕版印刷术诞生之前图书传播经历过漫长的抄传时代，因此，誊抄和出版均为古代书籍图书传播的不同方式。

我国古代并没有“出版”一词，常用的是“模刊”、“板印”、“梓行”、“刊刻”、“刊行”、“版印”、“印卖”等。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曾列举了各种古书序、跋、题记、碑记中出现的有关“刊刻”的词汇如雕、新雕、刊、新刊、开板、开造、雕造、镂板、钹板、钹木、钹梓、刻梓、刻木、绣梓、范本、校刊、刊行、板行等等^①。这些词汇均是古代的“出版”之意，其内涵在公元10世纪

^① 详见张志强著：《现代出版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4、5页。

的后唐长兴年间（930—933年）已有完整的表述。宋初《册府元龟》卷608“学校部”中记载，后唐宰相冯道重经学，为此向明宗李檀建言：“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冯道所言“雕摹流行”，后固定为“版行”、“雕版”、“付梓”等词^①。尽管这些词流露出图书传播流行的出版活动目的，但是在意义上更多的还是与雕版印本书籍的生产技能有关。这些词的概念与“出版”意义相近但是并不是真正的出版，只能算图书传播活动中具体的书籍印刷制作方式。

我国古代“出版”活动其传播途径通常是单向度的：传者—传播内容—受众。由于受物质条件的制约，传者和受者彼此间呈现主动发出和被动接受的关系。

从传者角度来看，我国古代的书籍（出版物）作为传播内容和知识信息的载体，其流行必须依赖于相应的物质载体（如甲骨、玉版、钟鼎、竹简、缣帛、纸张等）和技术条件（篆刀笔砚、雕版刊刻、手工印刷等），这些稀缺性材料和技术手段，通常被统治阶层所掌控，并为他们服务。古人运用这些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所传播的信息，最初并非是为了传播知识，而是为了载册历史、保存史迹，或者为统治者的流芳百世而效力。由此，最初的出版特性呈现出单向度的传播理念，传者只是统治阶层，传播内容和传播工具完全由统治者掌控。

尽管随着技术的改进，书写替代了契刻，竹简、帛书的轻便使得文字记录变得轻松自如，为书籍的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但是由于出版的技术与材料仍然为官方所垄断，出版理念的单向度依旧根深蒂固。尤其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统治者为了加强政权巩固和意识形态领域控制，书籍的编纂和出版活动愈发成为他们钳制民众思想的重要途径，出版、编辑与权力政治之间彼此纠结，以国家意志为主导性政治倾向的意识形态成为出版物的重要属性。

这种由上至下以思想钳制为目的的古代出版活动，至东汉末年廉价的书写材料纸张的出现和造纸术的发明，才有所突破。纸张以其物美价廉，为书籍在民间的流传提供了实现的可能。尤其是纸张便于复制、刊印的特征，使书籍得以大量出版、发行，极大地促进了信息和思想在全社会的交流和文化的繁荣，进而一步步突破统治阶级为垄断文化而设置的种种樊篱^②。

北宋初年至清中后期是我国古代出版的繁荣期，由于手工业印刷技术的普及，书籍的出版和传播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书籍出版逐渐摆脱了手抄时期单一的意识形态属性，商品属性开始凸现。

① 详见黄镇伟编：《中国编辑出版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页。

② 结论参见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2版，第8页。

首先,这一时期雕版印刷逐渐普及。雕版印刷也称整版印刷,发明于我国唐代,其方法就是将文字反刻在木板上,在刻字版上刷墨,之后用纸覆盖墨版上,最后用长毛棕刷子刷印,揭下来,就是一张印好的读物。这种方法也叫做“刷印”。唐朝末年,雕版印刷术已流行于东川、西川、淮南、江南、浙东、江西和东都等地。出版的书籍有字书(如《玉篇》)、韵书(如《唐韵》)、历书、佛经、咒本和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类的术数书。雕版印刷术发明后,促进了书籍的大量出版发行,雕版“刷印”书籍,大大降低了书籍出版成本,也使书籍的生产更为方便,价格也更为低廉,书籍成为一般民众也能独立购买的商品,推动了科学和文化思想的传播。随着印刷技术的推广普及,封建朝廷已无法垄断书籍的印刷业务,城市中出现了私人的出版商和出版业,据史料记载:成都是当时印刷业的一大中心,那里有一些书肆大量出售雕版印刷的书籍^①。

北宋中叶,毕升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此后陆续发明的木活字、铜活字、锡活字等出版革新技术,使更多的书肆在各地建立,出版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私人出版商自己刊印图书,参与销售。甚至官府、书院、寺庙也借着技术的便捷,加入到出版活动中从事书籍(出版物)的经营与生产。

宋以后的刻书业分官刻、家刻和坊刻三种。官刻体现封建集权制度下的国家意志;家刻更多体现了出版人和编撰者独特的个性思想;坊间刻印图书代表了出版人的自由思想与市民阶层、商品经济的结合,具备了现代出版的含义。受财力与物力的限制,坊间刻本在刻印技术上远逊于官刻、家刻的精美,印刷技术粗糙、偷工减料,但这并没有影响刻本的流行传播。以营利为目的的坊刻必须与图书市场的需求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出版更多的符合大众口味、读者喜闻乐见的书籍和作品,尤其是符合百姓阅读需求的通俗作品,大量的民间创作因此得以保存并流传。明代以后,戏曲、小说作品及生活类用书,主要依赖于坊间刻本传世。蕴藏在民间的反对封建伦理观念的、宣扬市民阶层赤裸裸的人欲(物欲、权欲、性欲)追求的,以及各种神秘主义的文化,都由于坊间刻本的流传而屡禁不绝。清代李渔的小说《无声戏》刚刚遭禁,书肆里就出现了改头换面的《连城璧》,流行依旧。这便是商品文化的威力,只要商品能够主宰这个世界,任何统治者的专制政策都不得不大打折扣。

公元751年,阿拉伯人从俘获的中国战俘中学会了造纸术^②,中国的雕版印刷

①《爱日斋丛钞》卷一,参见张召奎著:《中国出版史概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第70页。

② 详见张志强主编:《现代出版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45页。

术14世纪由马可·波罗传入欧洲，在造纸术和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德国人谷登堡1450年发明了铅活字印刷术，并成功研制机械印刷。19世纪，西方的机械印刷术传入我国，机械印刷不仅加快了书籍的印刷速度，使得图书发行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加，降低了书籍在商业流通中的成本，并且实现了书籍的工业化生产，现代图书出版产业因此确立。

书籍的工业化生产，改变了手工业时代传统书肆“前店后厂”的小本经营模式，以及由一位老板、几名伙计组成的编校、刻印、发行三位一体的作坊式组织结构。清代末年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以资本主义经营模式建立起来的出版企业，如创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1902年的文明书局、1906年的中国图书出版公司等等。这些企业组织严密、分工精细，并将编辑部从发行部、出版经营部中相对独立出来，改变了千百年来编印校合一的局面。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企业，也是我国近代出版界以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创办的最早的出版企业之一，该馆创办人为夏粹芳，又名瑞芳。他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自力更生经营中国人自己办的出版事业，取得了成绩。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辑大政的是连任商务经理和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在出版界享有盛誉。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经过，在其《四十年大事记》中是这样记载的：“民国前十五年（公历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正月初十本馆创业。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思、鲍咸昌、高凤池诸君。筹议创立本馆，乃集资四千元（实收三千七百五十元），在上海江西路的昌里货屋开业。其时所经营者，仅印刷一项。1900年，接盘日人所经营之修文印刷馆。1901年，张菊生、印锡璋二君加入本馆为股东，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原发起人每股照原升数为七倍，共计资本五万元。初，张菊生君在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因印书事常与夏、鲍二君接洽，夏君正想扩充本馆，拟聘张君主持编译事务，张君即投资参加。印君锡璋亦同时参加，公司基础，以是奠定。”^①商务印书馆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之所以在出版界独占鳌头，其成就得益于该馆所拥有的高水平的编译所和编译队伍的编辑理念、所长张元济的专业化管理和出版理念，以及商务创始人夏瑞芳的经营方针“经营现代化的出版事业，必须要有自己的编译所，而且编校和翻译人员必须具备相当高的学术水平，以便把好出版前的书稿质量^②。”商务印书馆是一个集编印发于一体的出版企业，最有特色的是拥有

① 国民政府教育部编：《教育年鉴》戊编第三，1934年开明版，转引自张召奎著：《中国出版史概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第199—200页。

② 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2版，第278页。

一个人才荟萃的编译所（编辑部）。

书籍工业化生产所形成的高效率和高利润，为书籍（出版物）加大发行量、拥有低价位提供了可能，出版物因此成为大众化的文化商品，编辑的选题策划、组稿、审稿等技术性环节在现代出版企业成为关键。现代出版企业中，编辑部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编辑自身的理念直接影响出版理念和出版企业的盛衰。

主政商务印书馆多年的张元济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教育家，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史学、文学修养颇深。早期他在接任编译所长一职时，首先广纳贤才，扩充编译人员名额，健全编译所的组织机构，委任所内各部主任：国文部主任高梦旦（凤谦），国文编辑蒋维乔（竹庄）、庄俞（百俞）、理化数学部主任杜亚泉。将大批躲避清廷迫害的变法维新知识分子介绍给夏瑞芳，安置他们在编译所工作，充分发挥各自所长和专业性编辑理念，夏瑞芳更是尊称他们为“老先生”，优礼有加、待遇丰厚，确立了编辑在企业中的专业地位和独立精神。这些编译人员的加盟为商务印书馆业务的蒸蒸日上提供了专业人才，使得其他出版社在实力上难以与商务抗衡。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以教育救国、出版救国为出版理念，提倡新学、西学，废科举、兴学校，开启民智、昌明教育，出版并编译了大量的图书，为近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沈雁冰评价商务印书馆：“维新大业，数出版先驱，堪称巨擘^①。”成立于1906年的中国图书出版公司，是上海大买办资本家席子佩集资所建，这家公司实力上远远超过商务印书馆，不仅拥有自己的印刷厂，还计划在龙华设立造纸厂，尽管中国图书公司的资本比商务雄厚，可是因为编辑和发行的经验均不如商务，最终于1914年，出盘给商务印书馆，并宣告破产^②。

出版企业的创办、书籍的工业化生产，使得编辑部从发行和印刷部门中相对独立出来，催生了出版活动的职业化和专门化，确立了编辑的专业地位和独立精神。不过，所谓编辑的独立精神与古代编辑理念中的编者个体思想行为在性质上是不同的，现代编辑的独立精神须依附于出版企业主和职业经理个人的经营理念和人格力量，一旦企业易主，作为职业编辑的独立精神是否能兑现不得而知。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出版企业中，编辑工作更多的是在多种社会权利（国家利益、经济利益、权利组织）控制中的专业化职业行为，但这毕竟使出版在理念上逐渐摆脱了统治阶级的专制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垄断。随着清末出版活动的企业化发展，古代出

① 转引自《出版史料》第一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2年。

② 详见吉少甫主编：《中国出版简史》，学林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330—331页。

版从官方垄断的单向度理念型传播活动，逐渐演化为以追逐商业利润为目的的职业型传播活动。

如果说我国古代的出版概念，仅仅指书稿（作品）印成书籍（出版物）的工作，那么，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和企业运作，现代出版在概念上包括了编辑、印刷（复制）、发行三方面。尤其是发行环节的确立，将出版活动与商品流通环节直接挂钩，使得出版属性由自古以来以社会效益为重、以意识形态为主，转化为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的双重多元属性，实现了出版业在理念上的现代性转型。《大不列颠百科全书》（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第15版收录的“publishing”一词，从概况、图书出版、报纸出版、期刊出版、参考文献五方面，对“出版”的定义进行界定：“出版是一种对文字或视觉材料进行选择、加工、发行的工作。它已经从微小、古老的开端发展成为传播各种文化载体的巨大而复杂的产业。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①。”

第二节 理念出版与职业出版

现代出版产业的出现，使得出版成为一种职业，吸引了众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其中。一方面，他们以从事出版工作作为谋生的手段，将知识转化为生存能力，另一方面他们将编书、写书、出书作为影响世道人心的手段，将自己的观点融入所编、所写的书本之中，开辟出一个广阔的知识分子话语空间，这样的文化眼光，在以往的出版经营中很少。

11

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与知识分子现代性的转型密不可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由古典士大夫型向现代知识型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旧的文化价值体系随同旧制度崩坏、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尚未成形前，知识分子苦苦求索的价值转型历程。

余英时教授在分析古代“士”的特征时曾说：“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

①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Vol.2.Micropaedia:15th ed.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2002.415.转引自张志强主编：《现代出版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9页。